

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问题研究

——以 1861 年至 1945 年期间为例

高 洋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研究室,辽宁 沈阳 110044)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营口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开埠通商的港口城市。1861—1945 年,在民族经济和殖民经济的较力下,营口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并呈现一定的轨迹。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通商口岸,营口迅速成为东北贸易中心,又由东北贸易中心自然升华为东北金融中心,后来迫于竞争,主动由东北金融中心转型为辽南轻工业中心,最后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强迫下,衍变为特定物资供给中心。这期间,营口完成了三次经济转型。

关键词: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5)05-0103-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17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Yingkou in Modern Times

—Focusing from 1861 to 1945

GAO Yang

(“9·18”Historical Museum of Shenyang, Liaoning Shenyang 11004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Yingkou became the earliest open trading port.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al economy and colonial economy from 1861 to 1945,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Yingkou had been changed constantly, and showed us a certain track. As the earliest trading port of Northeast China, Yingkou quickly became the trade center in Northeast, and sublimed to the financial center in Northeast naturally. Later, it was initiatively transformed from financial center to southern light industrial center of Liaoning Province with the force of competition. Finally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olitical force, it became a particular material supply center. During this period, thre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were completed her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Yingkou 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了曲折而漫长的近代化之路,而持有坚船利炮的世界列强也在此时将殖民经济一并传播到中国,中国就这样在炮口的威逼下走向文明之路。东北地区由于地处边陲,受俄、日两国影响较大,因而其近代城市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有别于关内城市。以往学术界对其特殊性的研究不够,少数有涉及的学者或从宏观笼统述之,或单纯以金融、农业、贸易的某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加以评述,但都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

分析。笔者以营口为例,对其在开埠后的产业结构变迁问题加以研究,从而解析近代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史。

营口作为一座新兴的城市,其城市发展与国家命运紧紧相扣,是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史的微观缩影。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的多次变迁,正是当地民族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主动或被动做出的抉择,这既符合中国大历史中的典型规律,又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另外,其形成与演变对于我们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东北地区城市生活兴衰与社会发展研究”(14CZS033)。

作者简介:高洋(1982—),男,辽宁锦州人,博物馆馆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与经济、微观与宏观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发作用。

一、因开埠而新生的东北贸易中心

(一) 连接太平洋和东北内陆的枢纽——营口

营口原为辽河口外的一处沙岛,直到19世纪20至30年代才与陆地相连,并延伸至营口之处。^{[1]228}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11款所规定,清政府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2]作为对外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人经实地考察后,发现牛庄一带泥沙淤塞严重,于是将实际通商口岸改设在营口。这样,营口就成为东北第一处对外通商口岸。

营口地理位置优越,“临冥北构而东折,南走辰韩,百川朝宗”^[3],将太平洋和东北内陆连接在一起。营口位于辽河的出海口,船舶沿河而上可溯至郑家屯,全部航程为1312.5 km。再加上其支流浑河、太子河等,航程更有所增加。营口开埠,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内陆经济的发展。光绪后期,运载着大豆、粮食、烟草等经济农作物的船只总量已经发展到2万余艘。日本史地学家小越平隆在东北旅行时,看到辽河中船只之多,不禁感慨:“而往来河上者,尚艨艟如鲫,大有掩江之势。”^[4]清末的30年间,辽河的航运业日益发达,俨然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以辽河航运为纽带的东北市场流通结构。而在这种互动结构中,营口港也确立了在东北区域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二) 以大豆三品出口为代表的进出口贸易

优越的地理位置仅仅为营口提供了发展的可能,而真正使其崛起的是开埠后涌现的贸易机会,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的外销。辽河流域历来盛产大豆,且品质优良。1863年,清政府为改变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决定“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5]。于是,大豆三品成为商人贩运牟利的首选货物。据当时官方记载,驶达营口的外籍货船,从1862年的86艘快速增至1864年的274艘,其中约90%的商船租给中国商人,进行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的转口贸易。^[6]1872年至1894年,经营口输出的大豆三品输出额

累计达到8338万海关两,占此间东北输出总额的76.9%。^[7]甲午战争之前,尤其是开埠初期,大豆三品一直占营口港出口贸易的半数以上,而营口港又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大豆三品的外销,并且数量巨大,这为营口港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随着营口港的发展,对外出口产品也日益多样化,柞蚕丝、杂粮、烧酒、中药材、人参、鹿茸、皮革、鬃毛等商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长。同时,进口产品中最初占有绝对比例的鸦片,也逐渐被棉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火柴等民用产品所替代。到1903年,营口港的进出口贸易额相比1893年增长2.7倍,与开埠初期1864年相比则增长19.7倍,^[8]遥遥领先于东北其他对外贸易口岸。到1907年,营口港的输出额已达到1800万两,是大连、安东两港总和的3倍。^[9]在营口开港的最初40年,其进出口贸易额不但稳居东北地区第一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逐步跃升至第六位。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为营口城市的初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为后期其他行业的开创积聚了资本。

二、因商贸业而催生的东北金融中心

(一) 从事代理批发的“大屋子”兴起

开埠之前,营口还是“地方狃榛,几同草昧,百度未开,胥待治理”^{[1]109}的海边小村落。开埠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繁荣,营口在东北贸易体系的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吸引了大批外来资本。先是附近原牛庄、田庄台和盖平商业资本的移入,后来又吸引了全国各沿海省份及山西资本投资,并且英、美、俄、德、法、荷兰、挪威、瑞典和日本的商人也纷至沓来。

营口的商业都与进出口贸易产品种类相关联。例如,光绪元年(1875年)经营棉布和砂糖的商店只有东永茂1家,到宣统三年(1911年)增加到33家,经营大豆出口的粮栈共71家。^{[10]98}这些寄生于进出口贸易的商店(号)又称“大屋子”,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批发商,二是代理商,三是委托商。“大屋子”是营口港冬季封港,中外海上贸易暂时中断,中间商通过资本运作代理买卖双方批发买卖货物并提供仓储、服务的特殊行业。营口的“大屋子”种类繁多,有杂货布行、南货客棧、洋货铺、山货铺等,其经营大豆三品、柞蚕丝、棉毛织品、中药材、粮食等数十

种进出口产品。“大屋子”的兴盛迅速带动了营口当地商业的发展,经营各类商品的商户成批涌现。据营口商务总会统计,1910年仅营口外城商户就有601家,发展到1931年,商户数量已增加到2588家。^{[11]179,370}宣统元年(1909年),盖州优贡沈羹唐赴京参加朝试时路过营口,对其繁华颇为感慨,于是写诗云:“竹马繁华地,狂游向夕曛;笙声千户月,帆影四围云;世乱俗偏靡,言庞夷不分;可怜犹汉土,极目帐胡氛。”^{[11]146}

(二) 商贸业的兴起促进炉银业的兴盛

炉银的出现几乎与营口开埠是同步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虽然都以元宝银为货币,但是各地元宝银成色、重量不同,换算复杂,严重地阻碍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大循环。随着商贸业的发展,营口也像其他商贸城市一样,出现了银炉行当——即将不同规格的白银货币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银(元宝银俗称“营宝”,后更名为“炉银”)。“每届秋冬,三省农产上市,资金内转,凡南省或外国之来三省采运特产者,所携他省通币,势必先汇做炉银,再由炉银买做当地之钞票。”^[12]这样,炉银很快就成了东北地区与外界贸易的实际货币。

1875年以后,营口港同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其吞吐量以每年平均16%的速度在增长。^{[10]100}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种类的增多,“大屋子”的出现,交易的资金额变大,原有的元宝银渐渐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1880年,经当地裕盛祥银炉执事李润斋提议,创设“过炉银”。“过炉银”,即商人将现银存放在银炉暂不使用,使用时持票据去提取,买方也可以不使用现银,仅仅更改票据持有人即可完成交易。这样,银炉就起到了银行转账的作用,大宗交易也避免了过去车载船装的现银支付。此后,营口炉银业又创定了“三、六、九、腊4个卯期”,银炉到卯期无现银实现交割,只需“加色”。^①“加色”即为利息,显然这时的银炉起到了银行的信贷作用。营口通过炉银业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金融制度,并得到确立和完善,逐步内生成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民

间金融系统。营口炉银体系建立后,不但一度垄断东北的货币信贷业务,而且进一步吸引了国内外金融资本的入驻。从1898年起,华俄道胜银行、正金银行、大清中央银行、正隆银行、朝鲜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先后在营口开设支行,与当地的炉银钱庄进行金融汇兑业务,并将营口的资本信贷规模推向顶峰,使这一时期的营口成为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随着中东铁路、中长铁路的贯通,大连、哈尔滨等地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致使营口逐步丧失了东北贸易的霸主地位,但这并未影响到营口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例如,“1907年营口港的年贸易额3275.9万海关两”,“1931年的年贸易额12397万海关两”。^[13]在大连开港24年间,营口港的贸易额不仅没有减缓,相反增长了4倍多,归其原因,还是因为“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由之便利”^②。

三、因对抗殖民经济而蓬生的辽南轻工业中心

(一) 传统轻工业的经久不衰

营口开埠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营口的手工业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并在原有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近代工业萌芽。其中,以纺织、榨油两个行业出现最早,而且经久不衰。

开埠早期,东北的大豆出口额长期位列第一。中国商人为了开拓外国市场而造成的大豆的商品化,必然带来榨油工业的盛大,而营口作为大豆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然成为榨油工业的发源地。营口在1866年就已经有两个油房,到1896年,营口油房达30余家。^{[14]85}但这些油房采用的是人力畜力的楔式榨油,所以规模不大。1899年至1901年,营口的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3家油房先后采用机器的生产方式,^{[14]86}榨油业从而步入了现代轻工业的范畴。到1929年,楔式榨油的方法在营口已经完全绝迹,新式油房业工厂有23家,共有水压式榨油机292部,

^①于胥梦:《营口炉银史》,营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营口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4页。

^②于胥梦:《营口炉银史》,营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营口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46页。

螺旋式榨油机 354 部, 合计 646 部, 日产豆饼 32 486 片、豆油 133 150 斤 (66 575 kg), 有工人 876 名。^{[11]345} 1931 年, 营口的油房业工厂年产豆油 1 654. 62 万斤 (8 273 100 kg)、豆饼 330. 924 万片, 生产总额为 661. 848 万元, 占整个营口工业及小工业的比例高达 63. 02%,^①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

在近代东北进口产品中, 纺织品长期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且英国、美国、日本纺织品先后垄断过东北市场。营口民族资本家“为杜漏卮, 而挽利权”, 在一战期间, 将资本转向棉丝业。1913 年 8 月, 营口首家恒祥永织布厂宣告成立。到 1927 年, 有织布厂 87 家, 织机 1 200 架 (内有使用电力者 24 家, 织机 500 余架), 年产 60 万匹棉布。此外, 还有织带厂 40 家, 织带机 230 架, 年产织带 9 万打; 毛巾厂 11 家, 机械约 100 架, 年产毛巾 1. 35 万打; 织袜厂 75 家, 织机 200 余架。^② 此时, 营口已经是仅次于奉天、哈尔滨的东北棉纺织业城市。

(二) 新兴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营口作为港口城市, 最早开发的工业种类往往与贸易品种息息相关, 但随着近代工业思想的浸染, 与本地资源相关的新兴工业渐渐得到民族资本的青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 也为营口民族资本开创民族产业带来了机会, 其中以火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迅速发展。早在 1909 年, 营口就成立了海来公司, 专营生产牡蛎粉。此粉可以使火柴按擦时延缓燃烧, 是制造火柴盒的必备原料。^③ 此外, 营口附近的海城、大石桥、盖州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磷矿、萤石矿产地, 而这些都是火柴生产的必备原料。1913 年, 王灏、郭渭在营口青堆子创办“营口关东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东三

省民族资本最早创办的火柴厂, 其开创了东北民族火柴工业之先河。之后, 在营口青堆子又先后开办了三明、牲牲和志源火柴厂。营口火柴工业凭借紧靠原料产地的成本优势, 不久就在民族火柴工业中脱颖而出, 而后又击败了东北地区的日本火柴工业, 并阻止了瑞典火柴工业在东北的扩张。1927 年, 牲牲、三明、关东三家火柴厂年产火柴约 16 万箱, 并专门销往南满站沿线及锦州、洮南、热河一带。^④ 营口火柴业在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过程中, “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生产能力说, 满洲是最早达到完全不需要进口的地区”^⑤。

营口及附近的盖平、海城、熊岳、复州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硅石、萤石、硼矿、滑石、凌美矿等非金属矿藏。其中, 硅石、萤石、硼矿是重要的玻璃生产原料。随着民族资本对现代化工技术的逐步掌握, 玻璃工业在营口开始萌发。1929 年, 营口民族玻璃工业有东明、聚兴、利顺三家公司, 生产玻璃瓶、灯罩、灯壶、化妆品瓶、药瓶等制品, 并销往洮南、郑家屯、通辽、哈尔滨等地。^⑥ 除此之外, 民族资本还涉及卤盐、窑造、染色、印刷、制药、制鞋、食品加工、水产加工等轻工领域。与此同时, 锻冶、薄铁、配件、造船等重工业也开始萌芽。“九一八”事变前, 营口已经成为南满地区重要的轻工业中心。

营口开埠后, 东北成为中国资本与殖民资本竞争的舞台, 而在竞争的过程中, 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资本逐步丧失了对东北的经济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东北人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工业产品几乎都是外国商品, 而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除口粮外又几乎都出口到外国作为工业原料。20 世纪初, 东北形成了“日本—满洲、俄国—满洲的殖民地统治关系”^⑦。归其原因, 主要是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产业资本。而营口经济在东北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丧失

①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31 年营口主要工业统计表》《1931 年营口小工业统计表》, 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 内部发行, 1986 年版, 第 21 页。

②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29 年营口工业概况》, 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 内部发行, 1986 年版, 第 14-16 页。

③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29 年营口工业概况》, 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 内部发行, 1986 年版, 第 17 页。

④同上。

⑤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册), 内部发行, 1988 年版, 第 72 页。

⑥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29 年营口工业概况》, 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 内部发行, 1986 年版, 第 19 页。

⑦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册), 内部发行, 1988 年版, 第 585 页。

后,主动转型,通过炉银资本发展制造业,夯实了经济基础,又以制造业为依托,反过来带动贸易、商业的继续繁荣。营口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日本殖民经济在南满的统治基础。1931年,日本甚至把自身的金本位体系“除已将南满路营口支线运费改用银本位外,并拟在南满全线施行银本位制”^{[15]537}。

四、因日本殖民统治而衍生的特定物资供给中心

(一)扼杀民族工商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仅用4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但营口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1933年,营口主要工业及小工业生产总额达13 877 957.7元,比1931年增长32.14%。^①一个强大且不断发展的营口民族工商业的存在,是日本殖民者所不希望看到的。

早在1932年7月,日本就将营口的东三省官银号支号、边业银行支行、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强制整合为伪满中央银行支行,企图掌控营口的金融业。但是,营口的炉银业很发达,并在民间持有大量的民族资本,早已形成独立于银行体系外的民间借贷关系。1933年,美国为了使白银与货币脱离,大量购买白银,迫使其急速升值,导致白银的商品价值远远大于其货币价值。同年11月3日,伪满财政部命令:“从即日起,营口所有银炉停止营业,严禁炉银的铸造流通。凡依靠‘过炉银’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炉银5两兑换满币一元的标准价格兑换。”^{[11]499}1932年,日本银行则以低于每盎司白银25美分的价格收购,转手即以每盎司白银65美分倒卖到海外。在利益驱使下,曾经在营口工商业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炉银业迅速消亡。至此,营口的民族工业在缺少民族资本的支持下,也走向败落。

强制收购炉银事件的发生,使营口民族资本和日本殖民资本此消彼长。1934年6月,日伪颁布所谓的“产业统治声明”,对重要经济事业实行完全统治或半统治,主要工业则只允许政府或“特殊会社”

办厂。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日资开始大量强制收购营口民族工商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鲜纺织株式会社“得到关东军特务部的允许,向营口纺纱厂投资一百万元”^②,将其吞并改为营口纺纱株式会社。1934年,营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5000元以上者7家,1万元以上者32家,5万元以上者7家,10万元以上者7家,50万元以上者1家,100万元以上者2家,200万元以上者9家,1亿元者2家。^{[14]283}而此时民族工商业者由于缺少资本和政策支持,经营规模普遍不大。1939年“满铁”调查部对吉林、营口、锦州3个城市的中国人经营的最有实力的225家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进行调查,发现资本在“5万元以下企业194家,5万元以上企业10家,10万元以上企业21家”^{[14]519}。1935年以后,日伪又陆续推行对各种物资的配售统治。到1942年,几乎所有产业的原料、生产、销售环节都被日资把持,营口兴盛一时的民族工商业几乎绝迹于市。

(二)掠夺营口资源

日本在排挤民族工商业、实行经济垄断的同时,也加快了对营口资源的掠夺,并将其打造成特定物资供应的供给中心。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资源贫瘠的日本越来越倚重营口的非金属矿产、轻金属矿产、纺织品、纸浆、精盐等军用和民用物资。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将相关领域技术和巨额资本引入到营口,强迫推动“一业一社主义”(一种业务由一个会社垄断经营),造成相应工业的畸形发展。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想将营口及其附近的非金属和轻金属矿产据为己有,但因其一直由奉系官僚资本把持而无从下手。1937年后,南满矿业开发会社陆续强制收购西大岭采矿所、睿子峪采矿所、李家屯采矿所、沙岗台萤石矿、卧龙萤石矿场等矿区,并由日资建立了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滑石株式会社和南满制铁柱式会社,垄断了经营营口地区的非金属及轻金属采掘加工业。1940年,

^①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33年营口主要工业统计表》《1933年营口小工业统计表》,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2页。

^②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营口车站站长为朝鲜纺织株式会社向营口纺纱厂投资事给“满铁”的报告》,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33页。

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生产镁矿 700 吨(t)。^① 1943 年,满洲滑石株式会社生产滑石矿产 15 057 吨(t),占伪满总产量的 86.4%。1944 年,南满矿业会社烧炼菱苦土年产量达 26 376 吨(t);满洲制铁会社生产萤石矿 8 472 吨(t),占伪满总产量的 38.9%。^②

在其他领域,日资也不断加强垄断。营口纺织株式会社成立后,到 1942 年已缴纳的全部资本金达 1 000 万元,其事业已经涵盖纺织棉纱、棉布、染色、纤维生产等领域。1939 年,营口纺织达到其产量峰值,生产棉纱 42 870 件,棉布 1 139 435 匹。^③ 后来,营口纺织将其纺纱厂转向,专为日本军队纺织军用布匹,走上了战争工业轨道。1936 年,日商看中渤海沿岸地区的芦苇资源,企图用苇浆制造人造丝,后因成本过高改作造纸厂,并在营口成立了康德苇纸浆股份有限公司。1942 年,该公司改名为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资本总额达 2 057.5 万元。1943 年,其峰值年产白纸浆 7 283 吨(t),白板纸及手纸 4 427 吨(t)。^④

营口盐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汉魏,并且一直是东北地区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九一八”事变前,营口海盐可达到年产量 17.7 万吨(t)。1937 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多地掠夺营口海盐,将盐改为专卖,由民制官销。1940 年,日商成立营盖盐业会社,将民滩强归公有后并入满洲盐业株式会社。1943 年,营口原盐年产量达 657 728 吨(t),占当年伪满原盐总产量的 74.36%;精盐产量 19 318 吨(t),占伪满精盐总产量的 100%。^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营口经济虽然繁荣并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搜刮民族资本,打压民族工商业,掠夺中国资源,为日本军事侵略服务的基础上。1944 年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营口的日本殖民经济迅速败

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营口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运输少量军用物资外,几乎闭港。

五、小结

年轻的营口城市在不到百年间,完成了四种不同身份的转换。从产业结构看,其展现了一定的轨迹:营口作为东北贸易中心升华为东北金融中心,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在贸易发展中的必然升级,是一次经济规律的自发验证。营口作为东北金融中心转型为辽南轻工业中心,是民族资本迫于经济环境变化的主动转型,是在原有经济领域衰退后,规模化的民族资本对其他经济领域的主动探寻,是一次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营口作为辽南轻工业中心衍变为特定物资供给中心,是殖民者对经济自然发展的扭曲,其破坏了民族资本秉承的自由经济基础,人为制造以掠夺为目的的产业垄断,造成特定行业的畸形发展,是一次违背经济规律的殖民政治行为,所以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灭亡。

从以上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较力。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殖民资本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在贸易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殖民经济需要一个明确的贸易对手替他整合凌乱的新兴市场,因此其转而扶持民族资本进入贸易体系内。而当民族资本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其就会谋求和殖民资本一样的发展方式,并打破殖民经济对制造业的垄断地位。此时,老牌的工业国家英、美、德等国,会将产业升级至有更高科技支撑的制造业;以俄、日为代表的科技较落后的工业国家,则会陷入同当地民族资本的竞争中,近而演化为武力侵略,以阻止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中国东北恰恰是俄日两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因此,在东北

(下转第 131 页)

①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册),内部发行,1988 年版,第 158 页;参阅参考文献[15]。

②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 年)·矿业·非金属》,1949 年版,第(3)-102、(3)-108、(3)-114 页。

③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36—1945 年营口纺织株式会社产量及利润统计表》,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1986 年版,第 35 页。

④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营口造纸厂》,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1986 年版,第 52 页。

⑤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 年)·盐业》,1949 年版,第(8)-3 页。

过着同一的经济生活,接触的是相同的客观事物,就必然要在语言里留下某些特点。另一方面,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得靠共同的语言来联系,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能使共同的经济生活得到协调。^[17]这些都是那玛话与纳西语、傣语间以汉语为媒介关系词较多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维西傣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维西傣族自治县概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3.
- [2] 维西县志. 维西县少数民族概况[EB/OL]. [2010-05-25]. <http://www.weixi.gov.cn/Item/580.aspx>.
- [3] 其期自然村2013年调查表[EB/OL]. [2014-10-14]. <http://www.ynszxc.gov.cn/S1/S910/S932/S942/S94421/S94445/RL/2013.shtml>.
- [4] 云南省维西傣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维西傣族自治县志[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 [5]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2.
- [6] 何耀华.《云南通史》绪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6.
- [7] 宋永平. 余庆远与《维西见闻纪》[J]. 文献季刊,2001(1):250-255.
- [8]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9] 黄布凡.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10] 木玉璋,孙宏开. 傣语方言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 [11] 吴成虎. 维西汉语方言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12] 陆韧. 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的军事移民[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5(4):68-76.
- [13] 纳西族简史编写组. 纳西族简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5-52.
- [14] 郭大烈. 纳西族研究论文集[G].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2.
- [15] 龚荫. 明清土司通纂[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1.
- [16] 戴庆夏. 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J]. 语言研究,2006,26(4):1-7.
- [17] 马学良,戴庆夏. 语言和民族[J]. 民族研究,1983,1(1):6-14.

(上接第108页)

地区最早开埠的营口,就成了殖民资本打压民族资本的较力场。“九一八”事变后,政治的天平严重倾斜,营口的民族工商业也就免不了覆灭的结局,而日本殖民经济在其穷兵黩武下,也必然走向没亡。

[参考文献]

- [1] 邹逸麟,张修桂,王守春.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 [2] 黄月波,于能模,鲍楚人. 中外条约汇编[G].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85.
- [3] 沙迹,李建华,杨庆昌. 营口碑志辑注[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120.
- [4] 小越平隆. 满洲旅行记[M]. 上海:广智书局,1902:23.
- [5]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47.
- [6]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 海关贸易报告册[R]. 影印版.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 [7] 胡雪梅. 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与近代中国东北开发(1860—1931)[J]. 北方文物,2002(3):92-97.
- [8] 高玉宝. 营口港史[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59.
- [9] 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 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M]. 大连:大连满铁株式会社,1939:1189.
- [10] 张志强,杨学义. 近代辽宁城市史[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 [11] 于阜民. 营口通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2] 侯树彤. 东三省金融概论[M]. 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31:5.
- [13]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营口市志: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8,143.
- [14] 孔经纬. 新编中东北地区经济史[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 [15]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 东北年鉴(1931年)[M]. 沈阳:东北文化社,1931.